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中国西南民族的由来与发展”创新团队研究成果

西南民族史研究丛书

中国

西南民族关系史纲要

龙晓燕 陈斌◎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中国西南民族的由来与发展”创新团队研究成果

西南民族史研究丛书

中国

西南民族关系史纲要

龙晓燕 陈斌◎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纲要 / 龙晓燕, 陈斌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3
(西南民族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5482-1869-2

I. ①中… II. ①龙… ②陈… III. ①民族关系—民族历史—研究—西南地区—古代 IV. ①K2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20495号

责任编辑: 赵红梅

封面设计: 周 昉

西南民族史研究丛书



西南民族关系史纲要

龙晓燕
陈斌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430千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1869-2

定 价: 48.00元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3244 6503107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序 言

按习惯的说法，中国西南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中国西南”相当于今天的四川省、重庆市、云南省、贵州省，而广义的“中国西南”则还包含西藏和广西两个民族自治区。但在传统的西南民族研究中，常以川、渝、滇、黔为主。方国瑜先生从历史的角度说：“西南地区的范围，即现在云南全省，又四川省大渡河以南，贵州省贵阳以西，这是自汉至元代我国的一个重要政治区域——两汉为西南夷，魏晋为南中，南朝为宁州，唐为云南安抚司，沿至元代为云南行省——各时期疆界虽有出入，而大体相同。”^①当然，由于四川、云南、贵州分别与西藏、广西相邻，故在具体的研究中对西藏、广西也有涉及。

中国西南自古就是我国民族的聚居地之一，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汉族、壮族、彝族、苗族、瑶族、回族、藏族、白族、哈尼族、土家族、傣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羌族、景颇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布朗族、毛南族、普米族、怒族、独龙族、阿昌族、德昂族、基诺族、蒙古族等三十余个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这些民族尽管形成的时间有早有晚，但都拥有悠久的历史 and 足以让人惊叹的文化，他们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各种形式的交往，结成种种联系，体现出极其生动的民族关系画卷，丰富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内容。

—

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空间，是社会物质生产和生存的基本条件。生态环境和由生态环境所决定的生产方式、社会发展程度等构成了西南民族关系的基本发展背景和基础。

^①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略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页。

特殊的地理区位使得中国乃至亚洲的几个主要文化区都在西南延伸、接触、交融，从而使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显示出丰富的内涵。就中国来看，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和南方水田稻作农业文化在此交汇和碰撞；从整个亚洲来看，东亚大陆的农耕文化与西太平洋渔猎文化在这里延伸与交融。这种碰撞与交融导致了西南地区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在西南地区多有考古发现，如三星堆文化、滇文化中都有清楚的显示。在滇国青铜器中，“铜桶、靴形铜斧等，很可能受了东南亚青铜文化的影响；动物纹扣饰及成套的马饰，与斯基泰艺术和北方草原文化有密切关系；兵器中的铜戈、矛、钺等，则是仿照中原地区制作的；铜铠甲、有翼虎带钩等显然和中亚、西亚文化有关；彩色琉璃珠及蚀花肉红石髓珠等，则可能来自南亚地区”^①。正是在多种文化的交融与作用之下，才使西南地区产生了发达的蜀国三星堆文化和滇国青铜文化，它们以丰富的内涵、独特的民族风格在中国乃至亚洲文化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而文化的交流是需要人来完成的，文化的多样性也表明了西南地区地区曾经有过多种人群、包括外来民族的活动。《华阳国志·南中志》中关于永昌地区“有闽濮、鸠僚、僮越、裸濮、身毒之民”的记载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们汇聚在西南地区之后，他们必然要发生剧烈的碰撞，或战争或友好，或融合或分化，结成种种复杂的联系，并对西南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西南地区山峦纵横，河流众多，既有横断山、大巴山、巫山、大娄山、乌蒙山等高山大陵，波状起伏的高原，低洼的盆地，平原和起伏和缓的丘陵，又有长江、澜沧江、怒江、红河、伊洛瓦底江、珠江六大水系的大小河流。由于西南地区山地多且地形起伏急剧，垂直变化明显，因此自古以来西南地区各民族或居于高山之上、或分布于河谷之中、山间盆地、坝区之内，相应地呈立体状分布。这样，根据他们的生态环境，西南地区的民族就有山地民族、坝区民族、水滨民族之分。而这些民族的经济生活也受所居住环境的影响，有游牧、游耕和农耕等区别，彼此之间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特征。例如从百越系统分化出来的水族、侗族、布依族、壮族、傣族和后来迁入的汉族、回族以及受汉族影响很深的白族等多生活在山间坝子和低平的河谷盆地，他们长期从事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生产的稳定性强、规模大，因此他们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应地较高。藏、彝、羌等民族虽然继承了其母体的文化因子，仍然从事畜牧业，但与所居环境相适应，他们的

^① 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经济生活已和干旱草原的游牧民族有所不同。一方面，他们已经兼营农业作为补充，另一方面不再按南北向的季节游动放牧，而是垂直向上下游动放牧。居住在温带、亚热带山区、半山区的拉祜族、基诺族、怒族以及德昂族等，由于所居地山高坡陡、森林茂密，没有规模放牧以及在较小范围内休耕轮作的条件，但却有在一定区域内从一山迁往另一山的可能，再加上山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这就使得他们也长期从事游耕经济，同时又兼及狩猎、采集或渔猎，处于低层次的发展之中。在以上三大类型的民族中，由于各民族的居住环境并不完全相同，他们在生产、生活诸方面相近的同时，又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性，使西南各民族的经济生活还有特点不同的亚型。这样，生态环境的复杂性一方面导致了西南地区各民族在经济生活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生活上各具特性而又并行不悖地发展，另一方面它又使得各民族为弥补自己在生活用品、生产工具等方面的缺失而互通有无，从而形成了经济上互相依存、文化上互相影响、“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民族关系。

二

从民族的亲缘关系来看，除汉、回、蒙古等民族外，今天的藏缅语各民族与氏羌集团、壮侗语民族与百越集团、孟-高棉语民族与百濮集团、苗瑶语族与盘瓠集团有源流关系。但民族不同于种族，它是一个社会概念。在一个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不断有其他的民族由于迁徙、战争等原因加入到其中，这些不同血缘的人们通过整合从而形成了本民族的基本文化面貌。因此，西南各民族的血缘并不是纯而又纯的，今天的壮侗语各民族与古代的百越部落共同体相比，除还具有一些文化因子，如语言上的相似性外，他们在血缘、文化等方面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他民族也是如此。藏缅语族民族中的白族，从有关的史料记载来看，他们是氏羌集团中的一部分与外族人口，尤其是汉族融合而形成的。据《唐会要》卷98《昆弥国》条记载，唐初的白蛮，“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各擅一州，不相统摄。自云其先本汉人”。而经历了唐朝与南诏的战争之后，又有大量的汉族士兵、工匠因为被俘而加入到了白族先民当中。近代很多白族村子供奉唐朝大将李宓和其他军将为本主，就充分说明了白族在血缘、文化等方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明清以后，由于大量汉族进入到了西南地区，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坝区、城镇和白族相处，在汉文化的吸引之下，滇东北、

滇中的一些白族反过来又接受了汉文化而成为了汉族。

由此看来，民族并不是孤立和封闭地发展的，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西南地区各民族不断地发生着联系，不断地分化和融合，从而形成了各民族同源异流、异源同流的复杂历史发展过程。因此，我们在研究西南地区民族关系史的时候，一定要认识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的内容是不完全相同的。今天西南地区的回族并不等同于元代西南地区的色目人，今天的白族也不等同于秦汉时期的僰人，由色目人到回族，由僰人到白族的发展过程就是众多的民族相互接触，彼此接受经济文化生活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是一个民族融合发展的过程。

西南地区民族融合的特点以自然融合为主。在西南边疆一线的民族融合大致可以分为汉晋、唐宋、元明清三个时期。前两个时期是大量的汉族融于非汉族之中，这种现象对于普遍意义的民族融合理论是不适用的，应属于一个特例。因为经典作家认为，如果征服民族的经济文化高于被征服民族，就可能使被征服民族接受征服民族的经济文化而融于征服民族。但是汉晋、唐宋时期进入西南边疆的汉族人口作为征服民族，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尽管自己有先进的文化，却在众多非汉族人口的包围中，显得势单力薄，先后融于西南其他民族。史家将这一民族融合的历史特例称为汉民族的“夷化”。元明清时期西南地区民族的融合有两个特点。第一，汉族吸收少数民族，它又分两种情况，一是主动地、不自觉地融入汉族；二是在封建统治阶级大汉族主义的压迫下，部分少数民族在民族传统上有所保持，但为了避免遭受民族歧视而称汉族，实际上这只是一种民族的假融合。第二，明代以后进入西南地区的汉族因为通婚的原因，也有部分融入边疆民族之中。总之，由于民族分布地域的变化，民族聚居的状态被打破，生产方式文化习俗的变更，西南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在元代以前表现为同源异流，在元代以后既有同源异流，也有多元合流（少数民族融入汉民族）和异源异流（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

民族研究史上曾经流行过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友好合作说”和“战争压迫说”两种观点。这二者都是片面的，因为民族关系是各民族之间一种长期的、较为全面的关系，各民族之间既有和平友好的一面，也有战争矛盾的一面。因此，西南地区民族关系的主流便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在各个领域的接触中，既和平友好、相互吸收，又矛盾冲突、相互排斥的这样一个辩证的历史运动过程。这主要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第一是各民族之间的和平交往、相互吸收的民族关系，主要内容为“朝贡”、互市、会盟。“朝贡”又称“通贡”，是一种由官方控制的民族间的经济贸易。

历史上，来自异民族国家的使节或比较重要的商团，都被汉民族统治者视为“贡使”，他们所带来的物资被称为“贡品”。而相互地交换物资在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支配下，则称为“赏赐”，这实质上是一种经济交流的特殊形式，是一种互通有无的贸易关系。互市是民族间贸易的主要形式，既有官方又有民间，一般多在边境开设交易市场，互市是改善民族关系，促进民族间联系的较好形式。会盟主要体现民族的政治关系。当两个民族国家或民族政治集团长期对峙，但这种长期对峙又不利于双方的发展时，便以缔结“和约”的办法来约束双方行动，以达到重建一种有利于双方的民族关系，如唐与南诏的贞元会盟。第二是以武装冲突的战争形式表现出来的民族关系，又分为民族征服战争和反抗民族压迫的民族起义。西南地区各民族在历史上有过多次民族战争，就其性质而言既有汉族政权为了扩大疆域而进行的民族征服战争，如公元前112年汉王朝攻破南越后，回兵降服夜郎及周围各部，设立牂牁郡；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征发巴蜀之兵，以武力征服与滇同属的劳浸、靡莫，大兵临滇，迫滇王降，设立了益州郡。也有如南诏国那样为扩大自己势力而对唐朝的攻击，如公元829年，南诏发兵攻占唐朝的嵩州、邛州，攻掠成都，掠夺男女百工数万人及无数财物而去，使“自成都以南，越嵩以北，八百里之间，民畜皆空”。此外就是反抗民族压迫的战争，如西汉昭帝始元元年益州郡廉头、姑缯反抗汉王朝的战争，王莽时牂牁、益州、越嵩等郡内各族的反抗战争等。这些民族反抗战争是具有正义性的。在整个历史时期的民族战争确实给各族人民带来了相当严重的灾难，但另一方面，战争的形式也可视为经济交往的一种手段与方式，因为当民族间的经济文化正常交往受到阻碍时，矛盾冲突可把僵局打破，促使新的经济交往的产生。例如，南诏国攻入成都带回许多能工巧匠，在生产技术上大大促进了南诏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

西南民族关系与中国历史的发展紧密相关，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因此，西南地区民族关系的发展，可划分为具有明显特征的几个阶段。

先秦、秦汉时期的华夏族及后来的汉族在自身政权力量的支持下，与西南各民族发生着以政治为主的关系。早在先秦，巴国、蜀国就与华夏族关系紧密。公元316年，秦灭巴、蜀，直接与西南夷发生联系。汉武帝时在

西南大设郡县，同时派大量汉族官吏及士卒前往戍守。这样一来，汉族与西南各族的经济文化关系也因之加强，使西南民族关系在整体上发生了第一次大的变化，打破了原来西南各民族内部民族的平衡状态。汉族较为发达的物质文化至少在部分当地民族中使用，这可以从秦汉时代西南边疆的出土文物中看到。例如，秦汉以前，云南的古遗址和墓葬中基本没有“汉式器物”。即使是交通比较方便、经济比较发达的滇东北、滇中地区，出土文物多具地方特色，说明当时汉族与当地民族的联系较少。而秦汉以后，尤其是西汉中期以后，西南边疆的“汉式器物”在数量上逐渐增加，其中以兵器最为常见。在川南、滇东北出土的农具上多有“蜀郡”“成都”铭文，日常生活中的各式铜镜亦常见。由物联系人，则可看到西南边疆的民族及其文化已开始走入中华多民族大家庭，开始走入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之中，成为了中华多元一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民族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在西南的巴蜀地区，建立了成汉政权的賨人及其他先后进入四川盆地的氐、叟、僚等民族逐渐融合到了汉族中。而在南中地区，秦汉时进入西南边疆的汉族开始“夷化”，并与当地民族上层联合，形成了一种地方政治势力，史称“南中大姓”。“南中大姓”及后来的爨氏家族，先后与蜀汉、晋发生着或战或和的关系，因此，这一时期复杂多变的民族关系，常以民族政权或民族政治力量之间的政治交往、军事冲突来表现。

降至唐宋，西南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民族关系由民族国家政权间的关系表现出来。具体来说就是汉民族建立的唐朝和以乌蛮为主体建立的南诏国之间的关系，是汉民族建立的宋朝和以白蛮为主体建立的大理国之间的关系。此外，由于当时全中国的特定历史背景，唐朝为了和吐蕃争夺洱海地区的控制权，扶持南诏，所以这一时期吐蕃又成为多边民族关系中重要的一员。从表面现象来看，这时的民族关系相当尖锐，双方以分立、对抗为主，但如果从中华多元一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高度看，南诏国、大理国的局部统一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正是这一段长达五个世纪的地区性初级统一的历史，为元代更高层次的全国大统一奠定了基础，为西南边疆各民族稳固地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部分做出了历史贡献。^①

元明清时期，元王朝在西南地区完整地设置了路、府、州、县等行政机构，在派流官治理的同时又实行土司制度，从而大大加强了其在西南地

^① 郭家骥：《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格局、特点及影响》，载《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第56页。

区的统治。明清两朝对西南地区的治理较之元朝更加深入，通过改土归流缩小了少数民族土司的权力，将直接控制区域从交通沿线和平坝扩展到了山区，从靠内地区扩展至边疆。此外又通过驻军、屯田等方式招引大量汉族移民进入西南地区，从此改变了元代以前西南地区汉族少而其他民族多的人口结构。西南各民族杂居共处、大杂居、小聚居的多民族分布格局已经形成，也形成了山区与坝区、边疆与内地各民族相互依存的经济文化联系和汉民族统治少数民族、坝区的少数民族统治山区的少数民族的政治联系。

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团结起来共同抗击帝国主义，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领土完整，成了近代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特别是地处西南边疆的民族关系，其范围已超出境内各民族的关系，政治纽带关系超过经济、文化的交流，西南各民族的内聚力增强，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上产生了一致性，出现了云南边疆各民族反对英国侵略者入侵的斗争。云南各族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促进了团结战斗的民族关系，各民族的民族情况突破了某一具体民族的范围，上升到了整个中华民族共同认同的高度。

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性，具体为：民族众多，有自己长期的活动空间，一些民族为西南地区所独有，如怒族、独龙族、羌族等；南诏政权强盛之时，其所控制的地区不仅仅局限于今云南，而是到了今天的缅甸西北伊洛瓦底江中上游地区及老挝、泰国、缅甸三国的连接地带，对东南亚的历史发展有过一定的影响；西南地区的各民族，虽然从族源上讲来源各异，但都算得上是土著，是历史上各民族相互融合的产物；西南民族曾在西南地区建立过巴国、蜀国、滇国以及南诏、大理国等政权。这些鲜明的特点，使我们可以通过对它们的研究，明确这些政权、政治集团对中国历史的重大影响，可以使我们深入探索西南诸民族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又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

西南地区先后建立过巴国、蜀国、滇国、南诏、大理国等一些有影响的政权，这些政权与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西南地区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巴国、蜀国、滇国和夜郎是在西南地区发展起来的民族政权，囿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他们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又和中原发生了一定的联系。由于巴、蜀在地理位置上和华夏各国相邻，因此巴国和蜀国很早就和华夏民族政权发生了联系，其中巴国甚至就是西周分封在汉水流域的国家。考

古发掘已经充分证明巴蜀文化在商周时期就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华夏诸国分裂割据局面的形成，巴、蜀的联系范围缩小了，它们主要和周围的诸侯国，主要是楚国和秦国发生为了共同利益而相互联合又为了争夺土地而彼此战斗的关系，最终，随着秦国的扩张，巴、蜀都被纳入了秦王朝的版图，而蜀人和巴人的大部分也融合到了汉族当中。而滇国由于与中原地区相距甚远，又隔着巴蜀，因此从记载来看，它主要是和巴蜀以及楚国有一定联系。秦汉以后汉民族与西南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是受不同时期的政治形势、双方的经济实力、文化的发展程度所制约的。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在汉民族政权强大时就归附汉民族政权，反之就观望，就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例如，东汉末年，军阀割据，中央王朝无力四顾，于是进入西南夷地区的汉族大姓遂独占一方，形成割据，并影响到蜀汉的统治。在此背景之下，诸葛亮南征，用恩威并举的手段招抚了大姓势力，设立了南中七郡。但好景不长，随着此后中原地区政权更替，在西南地区势力的减弱，大姓中的爨氏又形成割据。此外，在汉民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中，民族政策的好坏所起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当民族政策执行得好时，在西南地区中央与地方势力之间的关系就好，反之亦然。例如，西汉末年，王莽采取了错误的民族政策，结果导致西南地区“三边蛮夷愁扰尽反”^①，其后的统治者调整了民族政策，“渐以仁恩”，结果地方统治者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友好，人民的生活得以安定下来。又如南诏的独立，虽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因素，但地方官僚大汉族主义膨胀，民族政策失当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在各民族上层贵族掌握政权的情况下，西南地区各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主要取决于相互间的势力对比，为了各自的利益他们时战时和，既有斗争的一面，又有友好的一面。例如，西汉时期夜郎王、漏卧侯、句町王就为了争夺土地、财富而发动了战争。唐代南诏与吐蕃的关系也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从双方的势力来看，吐蕃强于南诏，所以南诏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抵制吐蕃而与唐朝联合，但由于唐朝政策失当，南诏遂又转向吐蕃，和吐蕃结成兄弟之国。但两者之间并不平等，南诏要向吐蕃交付各种贡纳，军队要供吐蕃役使，在此背景之下，南诏又和唐朝结成了联盟，共同对付吐蕃。

（二）汉民族民间与少数民族民间的关系

在阶级社会里，由于大汉族主义作祟，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也存在着

^① [汉]班固：《汉书·西南夷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846页。

隔阂，甚至出现了“汉到夷走”的情况。但总的说来，西南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以友好合作为主的。汉族进入西南地区后，与各少数民族共同生产生活，共同反抗统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结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关系。例如，在贵州大方县，汉族陈姓于清咸丰、同治年间，参加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太平天国失败后，彝族陈姓在他们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将他们隐藏在村子里，并对官府的人说：“这里住的都是我们陈姓一家”，从此同姓的两个民族就如同一个家族。^①而许多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例如仡佬族洪水之后兄妹成婚，生九子，即仡佬、苗、彝、汉等民族的传说也充分反映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

（三）少数民族内部民间的关系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②。由于各民族社会发展程度不一，因此一些后进民族不得不接受先进民族的统治。但从民间的情况来看，相同的族源，杂居共处，社会经济又具有互补性，这就使得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结成了不可分割的联系。

四

由于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过程，中国西南民族关系表现出了下列特点：

（一）分布上的大杂居与小聚居

西南地区的立体地形、立体气候，导致了民族的立体分布，即在一个直线距离很近的区域范围内（通常是以坝区为中心），有的民族居住在山顶，有的居住在山腰，有的居住在山脚或坝区、河滨。例如，在云南文山，“苗族住山头，瑶族住箐头，壮族住水头，汉族住街头”；^③在元江，傣族分布在低海拔的热区，哈尼族、彝族多分布在山区，白族多分布在坝区和交通沿线；在贵州西部，“苗家住山头，仲家住水头，客家（汉族）住街头”。由于杂居分布，各民族之间形成了区域性的又难以割裂的民族关系，即政

^① 陈英：《黔西北民族关系史简论》，载《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4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

^③ 王子华：《试论云南民族文化的多元和谐》，载《云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治、经济、文化上相互依存的关系。

政治上的多元一体性早在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一些族群就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组织，各地“君长以什数”，各不隶属，有的甚至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例如滇国、夜郎等。此后，虽然西南地区逐渐被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统治，但由于西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统治者采取了因俗而治，仍然沿用各民族的首领对本民族人民进行统治的措施，因此许多西南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就独立发展了一套与其生态、经济背景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制度，例如，彝族的“则溪制度”，布依族的“亭目制度”，苗族的“鼓社制度”，瑶族的“瑶老制度”“石牌制度”，侗族的“侗款制度”，景颇族的“山官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各具特色，充分反映了各民族发展的差异性。但在各民族内部独立发展的同时，我们要看到，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仍然统一在一个国家里，对中央王朝具有强烈的向心力。历代中央政权通过郡县制、羁縻府州制和土司制与他们保持着越来越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秦代，王朝统治者开始经营西南地区，接下来的西汉王朝在稳定了北方之后，开始平定西南夷各地，设立了牂牁、越巂、益州等六郡，统治了西南大部分地区。由于西汉王朝在西南地区采取了温和的统治措施，其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不断在西南少数民族中扩大，到了东汉时，“未尝交通中国”的哀牢夷也在汉文化的吸引下内附，东汉王朝遂在其地的基础上建立了永昌郡，今四川、云南、贵州地区就此完全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版图。之后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内乱，西南地区各民族不相统属，也陷入了混乱之中。但在经历了南诏、大理国的局部统一之后，元代，西南地区各民族最终又加入到祖国大家庭中，成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西南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各少数民族之间乃至同一民族的不同部分之间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汉族从进入西南地区开始，在生产技术和经济制度方面都较西南地区各民族发达。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不平衡自各族群形成之日就已开始，随着明清汉族及先进的汉文化的传入，那些和汉族杂居的少数民族开始接受汉文化，社会发展水平与汉族渐相接近。而那些封闭的民族却仍然还处于原始社会发展阶段。直到新中国成立前，西南地区各民族社会还是封建地主经济、封建领主制经济、奴隶制经济、原始公社等四种社会经济结构并存。分布在平坝的白族、回族等民族，很早就已开始了农耕生产，在明清时已进入封建地主经济发展阶段。在同一时期的傣族、壮族及藏族等社会中，领主制经济仍处在稳固的发展阶段。而此时聚居在大凉山及小凉山的彝族则还停留在奴隶制社

会中，并带有不同程度的原始社会残余。在内地地主制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怒、独龙、傈僳、景颇等民族中的一部分却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从事着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不但各民族的发展有先有后，表现形式多样，而且同一民族内部由于地区间的差别，也有许多不平衡，例如，清代彝族就存在着地主制、封建领主制、奴隶制经济三种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这种发展的不平衡，使得西南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处于不平等的地位，阶级问题与民族问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极大地影响了各民族以及同一民族内部人民之间的关系。

（一）经济上的互补性

如上所述，由于族源、地理等因素的影响，西南地区各民族的经济模式有农耕、畜牧、游耕三大类型及众多的亚型。各类型的生产方式、生产工具以及生产品种是各不相同的，而这种不同也就导致了各个民族之间不得不“取长补短”，发生各种互通有无的经济交往关系。例如，限于其畜牧经济，藏族人民的食物以肉、乳、青稞为主，少有蔬菜，为补充身体所需的维生素，他们对茶叶的需求量就特别大。所以早在唐代，就有商贾将滇茶和川茶贩运到藏区，形成了著名的“茶马古道”。由于生产力低下，农作物单一，游耕民族也离不开商品交换，他们多以自己的土特产品和农耕民族交换生活用品，例如，苗瑶等族的食盐历来是通过交换而取得。在西双版纳地区，傣族将粮食供应山区，山区的哈尼、布朗、拉祜、基诺族则用自己所种的土特产及手工品与傣族交换粮食。农忙季节，山区的少数民族就下山来，帮助傣族农民耕种和收割，同时换回大米以维持生活。^①各民族在互通有无，交换各自产品的同时，也在经济生活中彼此影响。例如，在云南德宏州，景颇族在德昂族和傣族的影响下学会了种水田，而种水田的工具也是从外界输入的。西南各民族之间经济上的这种相互交往和影响，一方面促进了各民族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使他们结成了“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密切关系。

（二）文化上的多元交融

复杂的地形，众多的民族，使得西南民族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各异，具有鲜明的特点。从语言来看，属于汉藏语系的有汉语和藏缅语族的藏语、彝语、哈尼语、傈僳语、拉祜语等；属于壮侗语族的有壮语、傣语、布依

^① 高立士：《西双版纳山区民族历史上的传统生态保护》，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语、水语等；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有佤语、布朗语、德昂语等。从宗教来看，西南各民族的宗教信仰有原始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其中佛教又分南传上座部佛教、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基督教又分为新教和天主教，呈现出多元的宗教文化现象。作为展示民族文化及表现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民族审美等深层次民族文化的最佳形式的民族传统节日，^①在西南地区也是内容丰富、数量极多。既有汉族的春节等节日，又有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白族的三月街、景颇族的目瑙纵歌等等。由于各民族交错杂居，其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融混合现象也相当普遍，例如德宏州的阿昌族长期同周围的傣族、汉族、傈僳族及境外的缅甸人打交道，很多人都会讲多种民族的口语，久而久之，阿昌语中便渗入了缅、景颇、汉、傣、傈僳等族的语言成分。^②又如傣族与布朗、佤等民族，虽然来源各异，但他们都有文身、黑齿等相同的习俗，并且有共同的歌舞、乐器、民族节日，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西南各民族在文化方面的交流与影响。

① 王子华：《试论云南民族文化的多元和谐》，载《云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② 郭净等：《云南少数民族概览》，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从考古遗存看西南地区远古人类的交流	(1)
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及其文化交流	(1)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西南地区古人类的文化交流	(6)
一、川滇西部地区	(7)
二、云贵高原	(10)
三、四川盆地	(12)
四、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的关系	(13)
第二章 夏商周时期的西南民族关系	(16)
第一节 夏商周时期西南地区的原始族群	(16)
一、氐羌系统的民族群体	(17)
二、百越系统的民族群体	(17)
第二节 蜀的起源及其民族关系	(19)
一、蜀的起源及其内部的民族关系	(19)
二、蜀与夏商周的关系	(25)
三、蜀与秦的关系	(31)
四、蜀与楚的关系	(34)
五、蜀与西南夷及南亚地区的关系	(36)
第三节 巴的起源及其民族关系	(41)
一、巴的起源及其内部民族关系	(41)
二、巴与楚的关系	(46)
三、巴与蜀的关系	(49)
四、巴与西周、汉阳诸姬和秦的关系	(52)

第四节	滇、夜郎的民族关系	(53)
一、	滇的民族关系	(53)
二、	夜郎的民族关系	(58)
第五节	秦国在巴蜀地区的经营与建设	(60)
一、	秦灭巴蜀	(60)
二、	秦国在巴蜀地区的经营与建设	(62)
第三章	秦汉时期的西南民族关系	(69)
第一节	西南夷的分布及社会经济情况	(69)
一、	氐羌系统的民族	(70)
二、	百越系统的民族	(74)
三、	叟族	(77)
四、	苞满与闽濮	(78)
五、	苗蛮	(78)
第二节	秦汉帝国在西南地区的开拓与经营	(78)
一、	进一步加强在巴蜀地区的建设	(78)
二、	秦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的开拓和经营	(81)
三、	蜀身毒道的开通	(87)
四、	西南夷各民族的反抗战争	(90)
第三节	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	(93)
一、	楚人南迁	(94)
二、	汉人南迁	(95)
三、	夜郎、滇国的解体及夜郎、滇人的迁移	(98)
四、	夷人的东迁及与濮人的关系	(100)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南民族关系	(103)
第一节	蜀汉的西南民族关系	(103)
一、	东汉末西南地区的形势	(103)
二、	南抚夷越	(105)
三、	西和诸戎	(111)
四、	南中大姓和夷帅的关系	(114)
第二节	成汉政权的兴亡及西南民族关系	(116)
一、	魏晋时的西南民族关系	(117)